



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研究

The Research on R.G.Collingwood's
Historical Theory

张作成◎著



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研究

The Research on R.G.Collingwood's
Historical Theory

张作成◎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研究 / 张作成著.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6

ISBN 978 -7 -5117 -2644 -5

I . ①柯…

II . ①张…

III . ①柯林武德, R. G. (1889 ~ 1943) - 历史哲学 - 研究

IV . ①B56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0742 号

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研究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0(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55626985(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318 千字

印张: 17.25

版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6.00 元

网址: 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5562698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大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前 言

一、选题依据与价值

与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振兴相伴随的，是历史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深入是其重要表现。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一段重要发展历程。^① 柯林武德，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学者之一。有的学者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状况，列举影响中国学术界的人物中就有柯林武德。“对于‘谁在影响中国心智?’这一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除了马恩毛邓，就是德（亚里士多德、康德、萨义德、庞德、赫尔德、柯林武德）、尔（海德格尔、卡西尔、黑格尔、托克维尔、韦伯〔尔〕、贝尔、波斯纳〔尔〕）、克（哈耶克、洛克、诺奇克、克拉克、布莱克、拉塞克）、斯（诺斯、科斯、霍布斯、罗尔斯、哈贝马斯、吉登斯）。这就是三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为当代奠定的阅读和研究语境，是我们思考和回答‘中国问题’的起点和归宿。”^②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③是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考古学家和业余画家。他“有着不平凡的双重职业轨迹：既是牛津大学出身的哲学家，又是谙熟罗马不列颠研究的实践考古学家。这样的‘研究’经验加强了柯林武德的哲学著作在历史学家中的声誉，因而使他的影响超

^① 有关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8年这30年间发展历程的总结回顾，参见于沛：《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三十年：1978—2008》，《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第25—3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连续在2008年第2—4期刊登三组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30年”为主题的圆桌会议文章。

^② 凌斌：《走向开放的中国心智》，《读书》2009年第1期，第7—8页。

^③ 全名是Robin George Collingwood，生于1889年，卒于1943年。

出一小部分对历史学感兴趣的哲学家范围”^①。但柯林武德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他生前的学术研究不被学术界的同行重视，但在他去世后却被诸多英国以外的同行给予颇高评价。他生前的学术研究不为人知的表现是：“1943年柯林武德逝世时，《纽约时报》刊登的讣告，仅提到他收集了七千个碑铭，并且说他‘对罗马不列颠时期日常生活的了解，可能比任何其他研究权威都深入’。”^②殊不知，柯林武德本身就是一位知名的罗马不列颠史研究专家。他有影响的著作《历史的观念》是在他逝世后诺克斯根据他的演讲和手稿编辑出版的。1946年这本著作面世后，英国、美国、荷兰等国学术界，开始关注与研究柯林武德思想。他的历史哲学^③，就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哲学、美学、考古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

研究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学者，始终很关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随着柯林武德手稿资料的发现与部分出版，一些学者研究历史重演思想，并将它看作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核心。近年来，国外柯林武德研究的趋向是，学者们根据已经出版的著作和可以查阅的手稿资料，阐述历史重演思想的内涵，并评价它在柯林武德史学理论中的地位和在学术界的影响。国内学者研究柯林武德史学理论，重点是根据《历史的观念》解释和评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国内学者对柯林武德的历史重演思想，未曾进行深入研究。本书研究选题具有下述三方面价值。

一、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做一些深入研究工作。1946年后，国外学者开始关注柯林武德思想研究，在哲学、美学、政治学等领域都取得丰硕成果。本书将研究视角限定在柯林武德史学理论上。在这个方面，研究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外研究者给柯林武德作出众多定位，如唯心主义者、相对主义者、怀疑主义者等。学者们对柯林武德的每一种定位，都能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佐证，而且往往会有“一仆多

^① Mark Day,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Continuum, 2008, p. 121.

^② David Boucher,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R. G. Colling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

^③ 根据行文语境，笔者交替使用“历史哲学”、“史学理论”两个术语，都指在认识论层面对历史学进行的知识论探讨。这是因为柯林武德使用“历史哲学”这一术语即为这种涵义，并没有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赋予这个术语的本体论涵义。

主”的情况。这会产生理解与评价上的困难。例如，柯林武德在 1936 年的一份手稿中所写的一段文字，经常被柯林武德思想的研究者引用，并据此对他作出上述诸种评价。^①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英美学界研究者主要是哲学家，他们在研究柯林武德过程中主要寻求哲学的学科定位，不注重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研究，也不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只选取其理论体系中相关问题进行“点对点”的研究。艾伦·多纳根 1962 年出版的《后期柯林武德哲学研究》^②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全面地评述了后期柯林武德研究的各个论题：情感与意识，概念与命题，问答逻辑，艺术哲学，科学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等。比较而言，杜森 1981 年出版的《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柯林武德哲学研究》^③ 更为关注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研究，资料更为厚实，但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没有连贯的体系，更像一份柯林武德研究动态报告。威廉·德雷 1995 年出版的《作为重演的历史学：柯林武德历史观念研究》^④ 以历史重演思想为研究中心构建了柯林武德的历史观念体系。对柯林武德的这种融贯论解释，些许改变了学界占主导的碎片化研究方式。

就柯林武德史学理论来说，本书研究遵循这样的思路：在考察其所处时代背景与学术语境前提下，以联系的眼光理解柯林武德对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批判、问答逻辑、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思想的重演等学术论题之间的关系。按照柯林武德的理解，历史哲学是哲学的整体，是从历史的视角理解哲学，而哲学是以历史哲学来表现自身的。因此，他对问答逻辑、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历史重演思想的解释，都是对他整个史学理论体系的说明。柯林武德提出上述命题所面临的学术语境，

^① 这段文字内容是：“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角度，考虑罗马史；提累蒙特从一个 17 世纪法国人的角度，思考罗马史；吉本从一个 18 世纪英国人的角度，研究罗马史；蒙森从一个 19 世纪德国人的角度，钻研罗马史。问哪一个人的观点是正确的，是没有意义的。每个观点都是提出那个观点的人所接受的唯一可能选择。”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an Van Der Duss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xxii. 本书以后所引用的英文版《历史的观念》，如不特别注明，都指杜森在 1994 年重新修订的版本。

^② Alan Donagan, *The Later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③ W. J. 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1. 此书 2012 年由斯普林格出版社重新发行。

^④ William H. Dray, *History as Re-enactment: R. G. Collingwood's Idea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是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①

二、就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来看，很少有学者专门研究柯林武德史学理论。国内研究状况相对冷淡，并不表明这个研究课题没有研究价值。实际上，与国外学术界相比，国内的柯林武德研究还需在以下两个方面深入开展下去：首先，就研究材料的利用来看，国内学者研究柯林武德史学理论所依据的主要是《历史的观念》，而对《自传》和《史学原理》以及一些可以得到的手稿资料关注不够。按照“时代不同，解释不同；材料不同，解释不同”的观点来看，国内学者利用的研究资料不够充分，也是限制柯林武德研究深入的一个瓶颈。其次，就研究成果的深度来看，国内学者认识到柯林武德思想的价值，但对其作出唯心主义评价之后，就不再深入挖掘这些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与国内学者相似的是，国外大多数学者也认同柯林武德是唯心主义者这个评价。但在柯林武德史学理论价值的研究上，国外学界要比国内深入得多。

三、研究柯林武德这位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代表人物，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西方历史哲学发展脉络的认识。柯林武德所处时代的历史哲学，发生了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第一次范式转型。思辨的历史哲学探讨整个历史进程，试图解释其规律和发展方向。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主要研究历史认识论领域的问题，注重阐释历史

① 有关实证主义史学和兰克史学的关系，及兰克史学定性与评价问题在学界是有争议的。易兰在《兰克史学研究》中通过比较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认为兰克史学不同于实证主义史学，是客观主义的。在《历史的观念》中，柯林武德对实证主义史学提出了两个界定标准：一、奉行“事实+规律”的模式，但由于未能收集到概括规律所要求的事实规模，只是将研究工作限于收集和考订事实。按照这个标准，兰克及其追随者和孔德模式的信奉者，都可以看作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这是因为（一）兰克虽然精于史料考证，但这背后有其神意观念（如实地再现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以此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为指导。但其追随者所能直接继承的只是治史过程中对史料的考证这一点。这也是兰克在他的专题研讨班上非常强调的。实证哲学的创立者孔德虽然确定了“事实+规律”的纲领，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其追随者都只是埋首于纲领的第一部分，而忘却了纲领的第二部分（在考证事实的基础上发现规律，以此来证明历史的统一性）。（二）无论兰克史学传统还是孔德史学传统，对于历史学的影响主要是史料考证这一点，而非发现上帝赋予历史的统一性，或发现历史中的规律。国内外学者对柯林武德提出的这一衡量标准，都有所关注和评价。但较少关注柯林武德在研究中所应用的另一条衡量实证主义史学的标准即：二、以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理解历史学，以研究自然事实的态度对待历史事件。柯林武德按照这一标准，批评了狄尔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的历史思想中体现出来的实证主义倾向。柯林武德这个标准是否合理，我们姑且不论，但这确实是他在应用的。关于柯林武德所理解的实证主义史学的缺陷和对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系统分析这两个问题，参见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9—460页。

学的学科性质、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柯林武德在其论文、演讲和著作中，阐明了对上述问题的观点。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历史哲学发生从分析的或批判的到后现代的第二次范式转型，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相对主义倾向影响了海登·怀特等后现代主义者。但后现代主义者批判其理性主义倾向及其对历史知识合法性的辩护。

与历史哲学领域的重点转移相伴随的是，在历史学领域，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受到挑战。美国著名史学史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在《欧洲史学新方向》和《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中，都以兰克史学为范型的传统史学危机和遵循社会科学研究路线的新史学崛起为开端。历史学的这一转型在欧美各国一般发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例外，这一变化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

传统史学危机使历史学这门学科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们，从研究方法、内容和理论方面，证明历史学的学科独立性。柯林武德是史学理论领域的辩护者，他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历史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柯林武德史学理论影响了“二战”后西方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研究。在柯林武德之后，英美分析哲学家更多关注历史解释问题，如历史解释还是科学解释提供了历史学合法性保证问题，历史解释中是否存在价值判断等问题。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支持者与卡尔·亨佩尔理论的追随者，围绕上述论题展开学术争论。这在推动西方历史哲学发展同时，也体现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深远影响。

二、文献整理与批评

（一）英美学界的研究现状

1. 柯林武德著述的梳理与探讨

文本诠释法是研究思想家的基本方法之一。因而研究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我们首先需要系统梳理与评价体现其思想的有关文本。柯林武德史学理论方面的著述包括公开出版的著作、发表的论文与演讲、手稿三个部分。而公开出版的著作又分为其生前出版的著作和他去世后由他人编辑出版的著作两类。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由诺克斯编辑出版。《自然的观念》也是柯林武德死后由诺克斯编辑出版的。1994 年，杜森重新编辑出版《历史的观念》。1999 年，德雷和杜森在牛津大学出版社

档案中发现的未完成的《史学原理》手稿和其他历史哲学手稿的基础上，编辑出版《史学原理及其他历史哲学著述》。柯林武德手稿是研究其思想的另一类重要文本资料。

我们首先回顾研究者对《历史的观念》的评价。这指的是诺克斯编辑的版本。莫里斯·曼德尔鲍姆认为“柯林武德对历史观念的解读，是令人兴奋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极其有益的”，但其缺点是，过分强调哲学家的作用，忽视了对普通历史学家的分析。^① 查尔斯·比尔德认为尽管这本著作主要根据柯林武德教授1936年的演讲，不是对史学史的系统论述，但在1943年柯林武德逝世之前，它已经是成熟和完美的了。^② 亚瑟·墨菲指出，《历史的观念》易读、有启发意义、在思想上吸引人。但它也是一部不能令人满意的著作，因为它是柯林武德死后由他人编辑整理后出版的。这就不能很好地体现柯林武德的思想变化，并使其中的叙述协调一致。^③ 迈克尔·奥克肖特指出：“尽管《历史的观念》没有完成、不连贯，但它足以表明柯林武德没有被疾病和早亡阻挠，他为历史知识所做的贡献就像康德为自然科学知识所做的贡献那样伟大。”^④ 上述学者对《历史的观念》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但也指出其中的缺憾。

迈克尔·本特利肯定《史学原理及其他历史哲学著述》一书的两位编者德雷和杜森工作的价值。编者为该书所写的导言指出，诺克斯不仅改动了《历史的观念》中所使用的手稿，而且作出一系列关于出版柯林武德手稿问题的决定，这严重妨碍阐明柯林武德思想和准确理解其思想的酝酿与发展过程。诺克斯只是部分利用埋没于牛津大学出版社档案中的《史学原理》手稿，而这本来是柯林武德打算独立成书的一部分。德雷和杜森高度重视这部分手稿是有其价值的。^⑤

^① Maurice Mandelbaum, “Review: *The Idea of History* by R. G. Collingwood”,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44, No. 7. (Mar. 27, 1947), pp. 184 – 185.

^② Charles A. Beard, “Review: *The Idea of History* by R. G. Collingwoo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52, No. 4. (Jul. , 1947), p. 704.

^③ Arthur E. Murphy, “Review: *The Idea of History* by R. G. Collingwood”,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56, No. 5. (Sep. , 1947), p. 587.

^④ Michael Oakeshott, “Review: *The Idea of History* by R. G. Collingwood”,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62, No. 242. (Jan. , 1947), p. 84.

^⑤ Michael Bentley, “Review: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by W. H. Dray; W. J. van der Dussen; R. G. Collingwood”,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6, No. 465. (Feb. , 2001), p. 153.

研究者阐述柯林武德思想主要依据《历史的观念》，往往忽视同样具有启发价值的《自传》。斯拜勒认为《自传》清楚地体现了柯林武德的立场，它的哲学意义在于它评价了英国哲学中实在论运动的整个发展过程，兴起、盛行、衰落。尽管他对实在论的评价并非完全令人满意，但他确实看到实在论的一些缺点。^① 霍华德·翰内指出柯林武德厌恶象牙塔式哲学和历史学，严厉批评主张道德哲学对道德行动毫无影响的实在论原则。他声称自己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改变现实方面，柯林武德敬仰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战斗的哲学家马克思。^② 玛莎姆认为《自传》描绘了柯林武德反叛者的形象，他一反其所受的学校教育和牛津大学导师职责，试图建立自己关于哲学和历史学方法的新观念。《自传》的主要内容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③ 缪尔海德指出，《自传》记录了柯林武德对当时影响英国思想的两个主要哲学运动的回应；也描述了柯林武德自己的三个不同侧面——割裂理论与实践主张的怀疑者，职业思想家，渴望“无套裤汉哲学”的实践者。^④ 这些书评作者概述了《自传》表达的柯林武德思想主张，评价了其在英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柯林武德手稿分未刊手稿和“遗失”手稿两部分。^⑤ 关于未刊手稿，柯林武德妻子凯特^⑥于1978年、1980年先后两次，将柯林武德大量未刊手稿交给牛津大学图书馆保存。从1978年3月以来，学者们可以参考牛津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柯林武德手稿，但要引用这些手稿，需征得

^① S. P. L., “Review: *An Autobiography* by R. G. Collingwood”,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36, No. 26. (Dec. 21, 1939), pp. 717–718.

^② Howard Hannay, “Review: *An Autobiography* by R. G. Collingwood”, *Ethics*, Vol. 51, No. 3. (Apr. , 1941), pp. 369 – 370.

^③ F. G. Marcham, “Review: *An Autobiography*. by R. G. Collingwood”,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50, No. 5. (Sep. , 1941), p. 546.

^④ J. H. Muirhead, “Review: *An Autobiography* by R. G. Collingwood”, *Philosophy*, Vol. 15, No. 57. (Jan. , 1940), pp. 89 – 91.

^⑤ 关于柯林武德手稿的情况，是笔者根据以下论文和书籍中所述整理而成的。W. J. Van der Dussen, “Collingwood'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18, No. 3. (Oct. , 1979), pp. 287 – 315; W. J. Van Der Dussen, “Collingwood's ‘Lost’ Manuscript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36 (1997), pp. 32 – 62; R. G. Collingwood,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and Other Writings in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 H. Dray and W. J. Van Der Duss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⑥ 全名 Kate. F. Collingwood。

柯林武德夫人凯特的同意，因为她拥有这些手稿的所有权。出版和影印手稿，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柯林武德自己的意愿，他明确表示反对出版他的未刊手稿。在这些手稿中，有约 2700 页是讨论各种哲学主题的，其余是有关历史学和考古学主题的。这些主题包括认识论、形而上学、经济学、政治学、艺术和历史。这些手稿对于认识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有很大价值。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关于已经有大量论述的柯林武德思想发展历程问题，这些未刊手稿提供了新材料。二、这些未刊手稿也提供了柯林武德以前不为人所知的思想证据。其中之一是 1936 年手稿《人类变疯狂》（“Man Goes Mad”），清楚表明他对古代及当代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关注，是真诚的而不是偶尔怪想。这些未刊手稿并非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也不是对一个体系的系统阐述。但它们生动体现了柯林武德钻研某些问题时的想法。柯林武德写下来的演讲，那些 1926 年和 1928 年有关历史哲学的演讲自身是完整的。柯林武德的“遗失”手稿是指他没有完成的《史学原理》。他原来计划将《历史的观念》和《史学原理》作为姊妹书出版。但《史学原理》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2.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柯林武德提出的著名论题，也是学者们研究他的史学理论时，发生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者根据自己对这一命题的不同解读，对柯林武德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既有批评者，也有辩护者。从总体来看，批评意见占主导地位。

(1) 片面强调理性自觉，忽略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汤因比指出，柯林武德看作历史学对象的反思行为，相当于我们有目的地作出的行动。他所谓有目的地作出的行动，除了反思行为外，还包括其他种类的行动，如冲动行为和意志行为。这些冲动行为和意志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比他强调的反思行为影响更大。^① 柴尔德认为：“除了柯林武德看作历史知识唯一对象的思想之外，事件还有其他内在方面：除了思想，还有感觉或感情。”^② 哈特更进一步表明：“我意并不在于表明柯林武德有意忽略了人性和历史中的非理性方面。他并没如此。但他明确讨论这些因

^① A. J. Toynbee, “R. G. Collingwood's View of the Historian's Relation to the Objects that he Studies”, in *A Study of History*, Vol. 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 720 – 721.

^② A. Child, “History as imitation”,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 (1952), p. 200.

素时，否定了这些因素。他认为任何现实力量或任何力量，在位居王座的理性面前，都要退居次席。”^① 上述研究者都认为柯林武德将历史学过分理性化，忽略甚至否定其中可能比这更重要的非理性方面。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还有罗伯茨与加德纳。^② 德雷根据《史学原理》手稿分析柯林武德对过分理性化的指责所作的回应是：扩大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的意义，打破思想与感情之间的藩篱，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也包含感情的历史。但德雷认为这使柯林武德面临一个困境，因为感情能否像思想那样被重演，是值得怀疑的。^③

(2) 只适用于政治、哲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不适用于社会和经济史。鲍曼持这种观点。^④ 与此相关，柯林武德因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作用的态度，被雷尼尔、罗伯茨与格兰特批评。^⑤ 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质疑柯林武德强调思想作用。沃尔什为柯林武德所作辩护是：“说每个行动都有思想的方面，因此所有历史都可以从目的方面解读是一回事。说所有历史都是理性的，都可以从有目的地思考方面来解读，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⑥ 这既维护了柯林武德对思想的强调，也为他开脱了将历史学过分理性化的指责。哈里斯认为：“柯林武德并没有忽略任何方面。他不能忽略外在方面，因为那是他所要寻找的一切的证据。但唯独这个也并非历史知识的开始，只有当内在经验被认识与理解时，才能获得历史知识。”^⑦ 路易斯·明克指出：“怀疑柯林武德忽略自然事实，主要是个误解”，“他的观点很简单：只有在这些自然事实进入人类意识这个

^① J. N. Harrt, “Metaphysics,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Collingwood's Account of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33 (1953), p. 209.

^② T. A. Roberts, *History and Christian Apologetic*,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60, p. 13.; P. Gardiner,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 49.

^③ William H. Dray, “Broadening the Historian's Subject-Matter in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Collingwood Studies*, Vol. 4. (1998), p. 23.

^④ B. Baumann, *Imaginative Participation: The Career of an Organizing Concept in a Multidisciplinary Context*,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5, p. 131.

^⑤ G. J. Renier, *History: Its Purpose and Method*,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50, p. 45; T. A. Roberts, *History and Christian Apologetic*, p. 13.; C. K. Grant, “Collingwood's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Renaissance and Modern Studies* 1 (1957), p. 69.

^⑥ W. H. Walsh, “R. G. Collingwood's Philosophy of History”, *Philosophy* 22 (1947), p. 155.

^⑦ E. E. Harris, “Collingwood's Theory of History”,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7 (1957), p. 40.

意义上，它们才与历史学相关”。^① 上述研究者或者肯定柯林武德强调人类行为思想方面的正当性，或者证明柯林武德并没有忽略物质因素的影响。

(3) 只关注个人行动，不关注群体或集体行为。金斯伯格认为柯林武德的“历史学在于发现要解释的事件内部的观点，只有针对外交史这样关注个人具体行动的历史学来说才说得通”，“当应用于大范围的、集体性的历史时，例如经济史、语言史或制度史，它就束手无策了”。^② 加德纳、怀特和卡尔^③也持这种观点。与上述批评不同，一些研究者认为柯林武德的理论能解释集体性的行为与动机。代表人物是艾伦·多纳根和路易斯·明克。路易斯·明克分析，柯林武德忽视解释社会制度等集体性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他认为只有在这些社会制度进入个人意识的意义上，才与历史解释有关。而柯林武德的绝对假设理论，也指出个人思想和行动与人类社会制度的联系。^④

3. 重演思想

国外学者在解释柯林武德历史重演思想过程中，提出多种解释。这些解释可以分为方法论解释和非方法论解释两类。前者认为重演是一种历史认识方法。后者认为重演属于非方法论范畴。一些非方法论解释者，明确反对重演的方法论解释。笔者根据自己收集整理的文献资料，将研究者解释与评价柯林武德重演思想的学术史分为三个阶段。

(1) 从 1945 年到 1955 年，这一阶段的标志性年份是 1946 年，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出版，学者们开始关注柯林武德史学理论。历史重演思想就是学者们研究的问题之一。这一时期内，学者们对重演理论的解释主要是方法论解释。

《历史的观念》出版后，研究者主要将历史重演思想看作一种直觉

^① Louis O. Mink, *Mind, History, and Dialectic: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Bloomington &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71 – 172.

^② M. Ginsberg, “The Character of a Historical Explanation”,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21* (1947), p. 70.

^③ P. Gardiner,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 49. ; M. Whit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p. 148;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61, p. 65.

^④ Alan Donagan, *The Later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p. 206; Louis O. Mink, *Mind, History, and Dialectic: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pp. 174 – 178 ; “Collingwood’s Historicism: A Dialectic of Process”. in Michael, Krausz Ed.,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p. 163.

方法。对重演的直觉主义解释，成为方法论解释的主要表现形式。代表性人物是沃尔什和加德纳。他们认为，重演是解释或理解历史事实的一种直觉方法。重演意味着努力研究人们的头脑，直觉地重演人们所想的，而又不需要证明这种努力结果的合理性。沃尔什质疑与批评柯林武德：“很遗憾的是，柯林武德虽然敏锐意识到思考受历史局限的程度，却没有太在意历史思考受历史局限的范围。当柯林武德试图重建罗马不列颠历史时，对那种重建结果的正当性，他能确定到何种程度呢？”沃尔什认为，柯林武德忽视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他历史判断观念中的一个错误，即“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的中心任务是两个人精神上的联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精神的理解是独特的和自我理解的。尽管并非通过任何简单的方法，但只要努力审查各种证据后就能获得这种理解”^①。沃尔什显然并不接受柯林武德这个观点。

加德纳认为柯林武德在对过去的个人进行“内省式认知”后，要“探查人的精神，侦察他的思想”。因此，重演相当于“洞察”、“同情”、“直觉”、“心灵感应联系”。^② 大多数法论解释者都赞同对柯林武德重演思想的这种解读。这些支持者包括汤因比、柯亨、海登·怀特和亚瑟·马威克。^③ 上述对重演理论作出直觉主义解释的研究者，对重演理论的评价是消极的，态度是怀疑与讽刺的。在重演理论的直觉主义解释成为普遍认可的观点后，研究者对重演理论的批评主要有：重演理论抬高了直觉、感知等主观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使历史真理成为主观性的。重演理论排除了一般性知识在历史解释中的运用。提出这种批评的研究者有加利和芒兹。^④

^① W. H. Walsh, “R. G. Collingwood’s Philosophy of History”, p. 158.

^② P. Gardiner, *The Nature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p. 29, 39; “The Objects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Philosophy* 27 (1952), pp. 211 – 220.

^③ A. J. Toynbee, “R. G. Collingwood’s View of the Historian’s Relation to the Objects that he Studies”, in *A Study of History*, Vol. 9, pp. 730 – 734; J. Cohen, “A Survey of Work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46 – 1950”,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 (1952), p. 177; Hayden White, “Collingwood and Toynbee: Transitions in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English Miscellany* 8 (1957), p. 166; Arthur Marwick, *The New Nature of History: Knowledge, Evidence, Language*, Hampshire: Palgrave, 2001, pp. 40 – 44.

^④ W. B. Gallie, *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4, p. 18.; P. Munz, *The Shapes of Time: A New Look at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68.

(2) 从 1955 年到 1975 年。学者们在这一时期内对重演理论的解释主要是非方法论解释。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一些研究者认真思考重演理论，开始反思、批评之前的直觉主义解释。他们指出：那些直觉主义解释者认为，通过一种非推理的、直觉的渗透，就能理解思想，确定历史事实。他们不赞同对柯林武德的重演理论作出直觉主义解释。但起初他们的人数很少，影响也小。多纳根认为，柯林武德提出的“如何或在什么条件下，历史学家能认识过去”、“为了认识过去，历史学家必须做什么”等历史学论题，不是就历史学方法论方面提出的。因而对重演理论作出方法论解释是种误解。^① 其他研究者后来评论重演理论的直觉主义解释时，都支持多纳根的观点。还有一些方法论解释者，如加德纳和德雷放弃了此前立场。尽管如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和 70 年代早期，仍然存在重演理论的直觉主义解释。研究者对重演理论作出直觉主义解释的可理解之处在于，柯林武德经常使用“内部”、“外部”的隐喻，而且他在已刊和未刊著述中，并没有否认这种直觉主义观点。

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对重演理论的非方法论解释逐渐突显。代表人物有多纳根、德雷、路易斯·明克、休梅克与斯佳盖斯塔德。^②

(3) 从 1975 年到现在，这一阶段的标志性年份是 1978 年，牛津大学图书馆允许研究者参阅柯林武德未刊手稿。柯林武德大量手稿的发现与公开，使研究者能够更全面地认识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特别是其重演思想。研究者开始重新认识与评价重演理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心，已不是对重演理论作出何种解释的问题，而是如何评价重演思想的地位与如何认识重演思想的影响。

研究者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重演思想的定位问题。德雷指出关于重演思想定位的争论是，重演思想是想在方法论上，还是在概念上立论。

^① Alan Donagan, “The Verification of Historical These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6, No. 24. (Jul., 1956), pp. 206 – 208.

^② W. H. Dray, “R. G. Collingwood on Reflective Thought”, *Journal of Philosophy* 57 (1960), pp. 157 – 163. ; Alan Donagan, *The Later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pp. 213 – 216. ; L. O. Mink, “Collingwood’s Dialectic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7 (1968), pp. 7 – 33. ; *Mind, History and Dialectic: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pp. 22 – 53. ; “Collingwood’s Historicism: A Dialectic of Process”, in Michael Krausz ed.,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pp. 72 – 123. ; R. G. Shoemaker, “Inference and Intuition in Collingwood’s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Monist* 53 (1969), pp. 101 – 113. ; P. Skagestad, *Making Sense of History : The Philosophies of Popper and Collingwood*, Oslo: Universitetsforlaget, 1975, pp. 52 – 54, 87 – 89.

方法论上，重演是历史直觉发挥作用的体现。概念上，重演的目的在于说明历史理解由什么构成，而不是如何去实现它。^① 杜森认为柯林武德的重演思想并不是历史学方法论的建议，并不是对如何获得有关过去的可靠知识的方法论建议。重演思想是对“历史知识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所作的回答。^② 列昂·戈登斯坦指出，将重演思想看作理解或解释已经发生事情的一种方法，只是忽略重点。^③ 卡斯顿·斯杜伯认为，柯林武德正确之处在于坚持重演思想在解释理性个体思想方面，在认识论上处于核心地位。柯林武德并非将重演仅仅看作历史学方法，而是看作研究其他人精神的一般性方法。^④

研究者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重演思想的评价。科迪认为柯林武德对历史知识的勾画，如谈论证据、证词等，接近于幻想或虚构。柯林武德一直努力使历史学家的资料完全依赖历史学家理论化的想象。他怀疑历史学资料和历史学家对证词的依赖，但这种怀疑是不成功的。^⑤ 沃尔夫冈·冯·莱登质疑柯林武德期望一个完全“建构主义的”历史理论，而且否认“重演”的可行性。柯林武德基于两个思想的同一性而实现的思想重演，低估了两个思想之间的差异。要重演过去的思想，历史学家必须站在过去人物的立场上，必须将自己放在过去，采取他们的观点，接受他们的信仰与价值观。但这些都是不可能的。^⑥ 杜森指出，柯林武德对传记的讨论表明，历史哲学并不必然片面地关注个体。而这正是柯林武德受指责之处。柯林武德认为环境对文明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自然环境在历史中的作用是重要的。但他的观点却被理解为“忽视物质与社会客观环境的作用”^⑦。

^① W. H. Dray, “Review: *Re-enactment: A Study in R. G. Collingwood's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1, No. 4. (Oct., 1986), pp. 930–931.

^② W. J. Van der Dussen, “Collingwood's Unpublished Manuscripts”, pp. 287–315.

^③ Leon J. Goldstein, “Dray on Re-enactment and Constructionis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7, No. 3 (Oct., 1998), pp. 409–421.

^④ Karsten R Stueber,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 Reenactment, Simulation, and the Fusion of Horizons”, *History and Theory* 41 (February 2002), pp. 25–42.

^⑤ C. A. J. Coady, “Collingwood and Historical Testimony”, *Philosophy*, Vol. 50, No. 194. (Oct., 1975), pp. 409–424.

^⑥ Wolfgang von Leyden, “Categories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History and Theory*, Vol. 23, No. 1. (Feb., 1984), pp. 53–77.

^⑦ W. J. Van der Dussen, “Collingwood's ‘Lost’ Manuscript of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y*”, pp. 32–62.